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

倪梁康 著



商务印书馆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

(2015/16 冬季学期讲座稿)

倪梁康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倪梁康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2620-5

I. ①胡… II. ①倪… III. ①胡塞尔(Husserl, Edmund 1859-1938)—哲学思想—研究②海德格尔(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B516.52②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4068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中国现象学文库
现象学研究丛书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

(2015/16 冬季学期讲座稿)

倪梁康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2620-5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25.00 元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编 委

丁 耘	王庆节	方向红	邓晓芒	朱 刚
刘国英	关子尹	孙周兴	杜小真	杨大春
吴增定	张 旭	张再林	张廷国	张庆熊
张志扬	张志伟	张灿辉	张祥龙	陈小文
陈春文	陈嘉映	庞学铨	柯小刚	倪梁康
靳希平	熊 林			

常 务 编 委

孙周兴 陈小文 倪梁康

《中国现象学文库》总序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现象学在汉语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兴趣,渐成一门显学。1994 年 10 月在南京成立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此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年一会一刊的运作节奏。稍后香港的现象学学者们在香港独立成立学会,与设在大陆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常有友好合作,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学者这些年来对域外现象学著作的翻译、对现象学哲学的介绍和研究著述,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均值得称道,在我国当代西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现象学事业才刚刚起步,即便与东亚邻国日本和韩国相比,我们的译介和研究也还差了一大截。又由于缺乏统筹规划,此间出版的翻译和著述成果散见于多家出版社,选题杂乱,不成系统,致使我国现象学翻译和研究事业未显示整体推进的全部效应和影响。

有鉴于此,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与香港中文大学现象学与当代哲学资料中心合作,编辑出版《中国现象学文库》丛书。《文库》分为“现象学原典译丛”与“现象学研究丛书”两个系列,前者收译作,包括现象学经典与国外现象学研究著作的汉译;后者收中国学者的现象学著述。《文库》初期以整理旧译和旧作为主,逐步过渡到出版首版作品,希望汉语学术界现象学方面的主要成果能以《文库》统一格式集中推出。

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和广大读者的关心和支持,藉《文库》这个园地,共同促进中国的现象学哲学事业的发展。

《中国现象学文库》编委会

2007年1月26日

目 录

序言	1
引论	3
第一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前篇:1916-1923 年	11
第二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中篇:1923-1928 年	34
第三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后篇:1929-1938 年	55
第四讲: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史续篇:1944-1976 年	80
第五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1):胡塞尔与犹太人 问题	104
第六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史外篇(2):海德格尔的 反犹太主义与纳粹问题	122
第七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1):历史哲学的 现象学-存在论向度	157
第八讲: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历史问题(2):海德格尔思想中的 黑格尔-狄尔泰动机	181
附录:关于 2014 年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椅之争”的媒体 现象学与去蔽存在论	197
资料一:胡塞尔 1931 年 1 月 6 日致亚历山大·普凡德尔的信	206
资料二:胡塞尔 1933 年 5 月 4、5 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信	216

2 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弗莱堡的相遇与背离

资料三：论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访谈中关于胡塞尔的

说法	228
资料译后记(代全书后记)	257
引用文献索引	259

序 言

大约从 2012 年年初陆续开始撰写题为《反思的使命》的胡塞尔思想传记。到 2015 年时,已经写到他的弗莱堡时期。在这里当然不可能绕过他与海德格尔的关系问题不论,因为无论就思想关联来看,还是就私人关系而言,这个关系都构成胡塞尔从 1916 年到弗莱堡直至他 1938 年在此去世期间最重要的思想生命内涵之组成部分。胡塞尔自己曾将他后期在海德格尔那里得到的经历称作“最沉重的宿命之一”^①,甚至“最阴暗的个人经历——最后的和对我最沉重的打击”。^②而 2014 年出版的海德格尔的题为《思考》的三卷(《黑皮本》1931-1941 年)以及 2015 年出版和将出版的题为《说明》的另外两卷笔记(1942-1948 年)^③,又为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增添了新的资料,尤其是为理解海德格尔在其中所说的“攻击”胡塞尔的根本动机提供了新的视角。再加上 2016 年将是海德格尔去世的第四十个

① Edmund Husserl, *Briefwechsel*, Husserliana Dokumente III/1-10,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en Haag 1994, Bd. II, S. 184(以下凡引该书信集的文字均仅在正文中加括号标明“书信”、卷数和页码)。

② 参见后面的资料二:“胡塞尔 1933 年 5 月 4、5 日致迪特里希·曼科的一封信”,倪梁康译,原载于:《世界哲学》,2012 年,第 1 期,页 134。——胡塞尔在这里接下来写道:“之所以最沉重,是因为我不仅对他的才华,而且对他的品格曾寄予了一种(现在连我自己也已经不再能够理解的)信任。”

③ Martin Heidegger, *Überlegungen* II-VI (Schwarze Hefte 1931-1938), GA 94, *Überlegungen* VII-XI (Schwarze Hefte 1938/39), GA 95, *Überlegungen* XII-XV (Schwarze Hefte 1939-1941), GA 96, *Anmerkungen* I-V GA 97, *Anmerkungen* VI-IX, GA 98,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2014-2015(这里列出的最后一部在笔者发表本书时尚未出版)。

年头,2018年也将是胡塞尔去世的第八十个年头。这几重因缘会聚的结果就是笔者在这里提交的关于胡塞尔与海德格尔关系或关于海德格尔与胡塞尔关系的文字,共分五个部分。可以说它们是笔者以某种方式对此长期萦绕在心头的关系情结所做的一个了断和清理。——这里所说的“关系”,既是指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是指他们之间的思想联系。

引 论

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是一本大书,但无事最好不去打开,因为每次翻阅都或多或少会让人产生郁闷和恼怒的感受。在此关系中涉足越久,就越会不自觉地生发出为胡塞尔打抱不平的念头。^①记得张祥龙有一次曾对笔者抱怨说:在他认识我的几十年里,我在谈到海德格尔时总会冷嘲热讽几句。回想起来的确如此。这也提醒我开始留意和反思自己对海德格尔所持有的根本心态。从硕士期间开初计划研究海德格尔起,到后来按耿宁的建议而先转向胡塞尔,最后始终停留在他这里,没有继续扩展至海德格尔的整个哲学。——我对海德格尔的态度是随着对他的思想与人品的日趋深入的知晓而逐步改变的,也是随着对他人的海德格尔回忆与评价的日趋增多的了解而逐步转向的。

总起来看,我的态度虽然略有异于想将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综合为一的兰德格雷贝、伽达默尔、珀格勒、芬克、黑尔德、科洛韦尔、扎哈维等,也不同于反海德格尔的君特·格拉斯、维克多·法理亚斯、胡戈·奥特等,更与各种类型的狂热忠诚的海德格尔追随者们(Heideggerianer)^②划清界限,但说到底,我对海德格尔的好恶基本上与雅

① 卡尔·舒曼的文章“论海德格尔在《明镜周刊》谈话中关于胡塞尔的说法”就是一例。参见:Karl Schuhmann, „Zu Heideggers Spiegel-Gespräch über Husserl“,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 32, H. 4 (Oct.-Dec., 1978), S. 591 - 612;该文的中译文参见本书后面资料三。

② 海德格尔《黑皮本》的编者彼得·特拉夫尼曾对“海德格尔追随者”做出如下特征刻画:他们的标语是:海德格尔没有反犹主义;即使有,这对他的思想也无关紧要。(参见:Peter Trawny, „Die letzte Hand des Zauberers“, in: *Neue Zürcher Zeitung*, 18. 4. 2015.)

斯贝尔斯、勒维纳斯、约纳斯、施密茨、洛维特、哈贝马斯、卡尔·舒曼,甚至阿伦特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而且与海德格尔传记的作者萨弗兰斯基也是基本一致的。

在面对海德格尔时,以上提到的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承认这里会有一个理智与情感的分离。在理智方面,我首先会想到当今最重要的海德格尔诠释者,也是德国现象学学会的第一任主席奥托·珀格勒(Otto Pöggeler, 1928-2014年)对海德格尔所持有的态度。——不过这里先需要做一个简短的插入说明:1985年去德国读书之前,耿宁先生曾让我在弗莱堡大学的维尔纳·马克思(Werner Marx, 1910-1994年)和波鸿大学的奥托·珀格勒之间选择一位指导老师。^①由于弗莱堡是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曾任教过的地方,也由于它离耿宁居住的伯尔尼比较近,我最后选择了弗莱堡。但对于珀格勒,我仍然隐约地将他视作自己的一个可能导师。——珀格勒曾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和整个思想发展做过一个总体的评价:“要想成为现象学家,就不能单一地从胡塞尔出发,也不能单一地从舍勒出发。海德格尔既对胡塞尔,也对舍勒提出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分析了艺术与活的自然,并以此而开启了新的问题域。这是一个从胡塞尔和舍勒出发根本无法再解释的海德格尔。此外还有对尼采的辨析以及在二战之后对海森堡和布尔特曼的辨析。没有海德格尔的自然科学提问,海森堡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也适用于布尔特曼:布尔特曼与海德格尔是共属一体的。”

^① 这两位都是最重要的海德格尔专家,同时也谙熟胡塞尔现象学。前者的代表作是《海德格尔与传统》(*Heidegger und die Tradition*, W. Kohlhammer: Stuttgart 1961),后者则以《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Der Denkweg Martin Heideggers*, Günther Neske: Pfullingen 1963)闻名于世。两部著作均已成为海德格尔研究的经典。

不过,接下来珀格勒也对海德格尔后期语言风格有所批评:“后期海德格尔每过几天都会写出一首诗来,一首不是真正诗的诗,因为里面没有诗意。有些人,尤其是日本人,很喜欢引用这些诗。但在我所读到的上百首诗中几乎没有发现一首诗可以被说成是一首诗。而后期海德格尔却极其看重这些诗。”^①

我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珀格勒对海德格尔所做的这个总体评价。就我自己而言,在学术思想方面,我十分喜欢读早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文字,即他1928年从马堡回到弗莱堡之前的著述和讲稿。在研读它们时常常可以感受到他的原发思想的力量与驾驭语言的力量,而且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尤其是对海德格尔的研读往往会为我对胡塞尔和舍勒的理解提供极具启示性的帮助。而后期的“解释学海德格尔”文字虽然总体上还是有其自己的风格特色,但与尼采、荷尔德林等作家和诗人相比多了不少矫揉造作的成分。无论如何,就我自己的感觉而言,后期的解释学海德格尔总是显得,或总想显得比早期的现象学海德格尔更为深邃和更加智慧,但他做得总会让人觉得刻意而不自然。尽管珀格勒曾将阿道尔诺对海德格尔

① O. Pöggeler, „Erinnerungen - Hegel, Heidegger und Gadamer“, in: *Information Philosophie*, <http://www.information-philosophie.de/?a=1&t=2945&n=2&y=1&c=3>. 珀格勒在访谈的前面还提到1957年在巴黎听过保罗·策兰的课,“他在讲授海德格尔的‘物之物化’(das Ding dingt)以及诸如此类,而这些东西在波恩只是我们的笑料。”——如果想进一步了解珀格勒所说的“海德格尔对胡塞尔和舍勒提出的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什么,那么我们还可以参考哈贝马斯对海德格尔通过《存在与时间》所完成事业的总体评价:“以一种原创的方式如此地融合和重融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这两种竞争着的思想运动,从而使马克思·舍勒的实际性动机能够得以采纳,并被纳入到一个对主体哲学的后形而上学的、历史化的克服之中。”与珀格勒相同,哈贝马斯随后也要求,“在我们能够进入到实事的基质之前,必须摆脱海德格尔结合其角色所做的自身理解、装腔作势和主张”,排除所有那些“含有同样铭刻力量的阴暗因素,无论它们是赤裸裸地,还是随着荷尔德林一同登场”。(Jürgen Habermas, „Heidegger - Werk und Weltanschauung“, in: Victor Farías, *Heidegger und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9, S. 12-13, S. 35, S. 37.)

“本真行话”的批评^①视作“胡扯”(Mumpitz)和“纯粹的权力斗争”^②，我却觉得在阿道尔诺的这些批评中还是有意义可循，它与君特·格拉斯在《狗年月》中对海德格尔及其行话的取笑和“攻击”异曲同工，^③甚至也与珀格勒自己对海德格尔后期“作诗”的讥讽遥相呼应。海德格尔驾驭语言的能力固然毋庸置疑，但他可能成败都在于此。在早期的“本真话语”与后期的“海德格尔行话”之间虽没有一条截然的分界线，但彼此间的差异还是醒目得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但所有这些都还属于在海德格尔问题上单纯理智方面的判断和感觉。而在情感方面，一旦涉及海德格尔的生活，尤其是他的为人处世，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反感，而且始终也不明白他的深邃哲理与他的生活智慧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无痕相接！这也许是我放弃从胡塞尔研究进一步向海德格尔研究扩展的初衷，始终还留在胡塞尔这里的潜隐原因。而另一个明确无疑的原因当然在于，仅仅研究胡塞尔就已经让我此生忙碌不已，实在无法再更多分心于海德格尔的其他非现象学思想。我并不想拿自己去攀比扬·帕托契卡，但他的确也说过：“我已经获得对胡塞尔研究的巨大问题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至于我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深入了解海德格尔。”^④在我这里差

① 参见：Theodor, W. Adornos, *JargonderEigentlichkeit. ZurdeutschenIdeologie*,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64.

② 参见珀格勒另一次访谈录：“Ich schwimme lieber.” – EinGespräch mit Otto Pöggeler, in: *Journal Phänomenologie*, 11/1999.

③ 这也是引发海德格尔做《明镜周刊》访谈的原因之一。参见：G. Grass, *Hundejahre*, Göttingen 1993, 中译本：《狗年月》，刁承俊译，漓江出版社，1999年；R. Safranski, *Ein Meister aus Deutschland. Heidegger und seine Zeit*, S. Fischer: München 1994；中译本参见：《海德格尔传》，靳希平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558，以及笔者：“《狗年月》中的海德格尔”，载于笔者：《会意集》，东方出版社：北京，2001年，页196–203。

④ Jan Patočka, „Erinnerungen an Husserl“, in: Walter Biemel (Hrsg.), *Die Welt des Menschen – Die Welt der Philosophie. Festschrift für Jan Patočka*, Martinus Nijhoff: Den Haag 1976, S. IX, S. X.

不多可以这样说:我至此为止研究的海德格尔,主要是与胡塞尔相关的那个部分的海德格尔,而这个部分已然不小。

在我收集的海德格尔档案资料中有三方面的分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以及海德格尔与反犹太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关系。它们分别指向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现象学思想、伦理品格和政治实践。前面所说“与胡塞尔相关的那个部分的海德格尔”,横贯在这三个类别之中。这里还需特别说明一点:如果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问题主要与他的政治思想或政治感觉有内在的联系,那么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关系问题则最典型地表明了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道德品行。

海德格尔的人格或人品是有问题的。雅斯贝尔斯会说“不纯粹”、“不正直”;阿伦特则会说:“没品格”(Charakterlosigkeit)^①。在这点上,要想为海德格尔辩护很难。而且在思想史上,为他辩护的大都是与他关系相对较远的人。在他周围与他最亲近的人,最后都不为他辩护,至多是对他的德行缄默不语,例如他最亲近的长辈朋友胡塞尔、最亲近的同辈朋友雅斯贝尔斯、最亲近的情人知己阿伦特、最亲近的晚辈学生洛维特。在这个问题上,除非是铁杆的海粉,绝大多数人都不想也无法为海德格尔的德行辩护。他们至多会像海德格尔的犹太学生汉斯·约纳斯那样将此视作一个难解之谜:“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思者同时又是一个小人?”^②或者会像雅斯贝尔斯那样

① 参见: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 - 1969*, Piper Verlag, München/Zürich 1993, S. 178. ——阿伦特在1949年9月27日致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就海德格尔的问题写道:“您所说的不纯粹,我会称之为没品格,但在此意义上:他一字不差地就是没有品格,确实也没有特别坏的品格。”

② 参见:Christian Wiese, *Hans Jonas: Zusammen Philosoph und Jude*, Jüdischer Verlag im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177, Anm. 4; Hans Jonas: *Erinnerungen: nach Gesprächen mit Rachel Salamander*,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3, S. 299 ff.

怀疑：“一个不纯粹的心灵真的可以在不正直中看到最纯粹的东西吗？”^①

人们对将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与他的人格结合在一起思考的做法，海德格尔及其追随者们可能会不以为然。与钱锺书认为只要鸡蛋好吃就无须询问母鸡如何的看法相似，海德格尔觉得，例如在介绍亚里士多德生平时只须说：亚里士多德出生、工作、死去，这就够了。——然而真的够了吗？在亚里士多德的出生与死亡之间真的唯有工作，没有生活吗？

这种脱离思者本人的动机来思考一种纯粹思想的做法当真是可能的吗？如今这听起来像是现代神话！有些像是在讨论意识时只谈意向相关项而不谈意向活动。似乎对思想的纯粹兴趣才是真正的理论求知之惊异，而任何从被给予的思想出发去回溯给予性的思维活动以及思者本人的做法都是对家长里短的流俗好奇？——设果如此，那么以后所有思想史著作都应倡导匿名写作和出版才是。作者的自传更是应当被严厉劝阻！不过，无论这种做法是否可行，它倒是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好处，例如作者们不再会为了博取名声而费心去制作各种事件，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身上而非著作本身。

思者的思想与思者的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永远会是思想史研究需要处理的重要论题之一。但这里的文字并不打算专门讨论海德格尔的思想与其生活之间的关系，也不打算专门讨论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或他的人品德性。虽然在我至此为止收集的海德格尔档案资料中如前所述有三个大的分类：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海德格尔与胡塞

^① 参见：H. Arendt/K. Jaspers, *Briefwechsel 1926 - 1969*, a. a. O., S. 177. ——引发阿伦特这个评论的原因是雅斯贝尔斯在信中就海德格尔所说的话：“作为不纯粹的心灵——即作为感受不到其不纯粹而且始终不急于从中脱身出来，而是无思想地继续生活在肮脏之中的心灵——，一个人可以在不正直中看到最纯粹的东西吗？”

尔的关系,以及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关系,但我在这里只打算偏重讨论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即使它并不能与第一和第三方面完全脱离干系。

还在胡塞尔在世时,他与海德格尔的私人关系和思想联系就已经成为现象学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① 我们在雅斯贝尔斯、洛维特、约纳斯、勒维纳斯、帕托契卡、英加尔登等人的回忆录中已经可以读到这方面的思考。人们的研究兴趣不仅涉及他们二人的哲学思想联系,而且还涉及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品格差异。而对这两个方面,他们各自也都有所考虑并有所表达。

对此课题的至今为止最详尽的讨论是由哲学史家卡尔·舒曼给出的。他是专注于现象学运动的思想史家,在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和组织方面不弱于施皮格伯格,而在对思想家们的理解与把握方面甚至强于施皮格伯格。对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关系的问题,他在1976年之前始终保持沉默。海德格尔于这年去世,《明镜周刊》根据他的遗嘱发表了他十年前与《明镜周刊》记者格奥尔格·沃尔夫(Georg Wolff)的访谈:“只还有一个上帝能够拯救我们”。除了他对自己在二战时期的政治立场的洗刷尝试之外,其中有一整节涉及海德格尔对自己与胡塞尔关系的辩解。显然是出于一种打抱不平的想法,舒曼随后发表了他对海德格尔的长篇反驳文章,为胡塞尔做了辩护。舒曼的这篇文章是笔者读到的最为详细的研究胡塞尔—海德

① 按照舒曼的说法,“与此相关的最早研究可能是格拉塞利(G. Grasselli)的文章‘胡塞尔的现象学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La fenomenologia di Husserl e l'ontologia di M. Heidegger),载于:《新经院哲学评论》(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1928年,页330—347)”(Karl Schuhmann: „Zu Heideggers Spiegel-Gespräch über Husserl“, a. a. O., S. 591, Anm. 2)。在与此论题相关的德文著作中,可能最早的一部是胡塞尔自己也读过的朱利叶斯·克拉夫特的专著《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现象学哲学批判》(Julius Kraft, *Von Husserl zu Heidegger. Kritik der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Leipzig 1932)。该书在胡塞尔的书库中有存,上面题有作者手书献词:“献给枢密顾问胡塞尔先生,作者衷心感谢他的诸多启示。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32年4月28日”(参见:书信VI,页233)。